

【思辨争鸣】

编者按:学术界个人自觉和集体自觉的缺位,是制约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2000年以后流行起来的以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为特征的量化考核制度,助推了范式内精致化研究的流行。考核机制过于短期化,导致全球化的学术碎片化,对学术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旅游学科的发展,需要旅游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保持应有的定力,一方面,考核机制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有实质性的评价,也要有一定的量化指标;另一方面,研究成果的体系化和理论知识的体系化,对于整个旅游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样重要。

“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续)”之 “学术生态与知识生产”

王 宁,肖洪根,谢彦君,保继刚,马 波

王 宁:如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着更多的考核压力,这可能会造成代与代之间的不同。我们那一代人考核压力没这么大,还能坐下来写《基础旅游学》。现在都是一篇篇的小 paper(论文),全部量化为碎片化的创新,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去建构一个比较大的学说体系。当然,这一篇篇的小论文,对于学科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没有学术共同体无数点点滴滴的小研究,不但科学研究无法推进,而且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或大学者也缺乏产生的土壤。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一点一滴的小研究没有服从一个总的理论立场或方向,如果我们没有范式创新的勇气,没有建立新的理论学派的动力,没有按照一个总的学派立场来安排和串联各项细小的研究活动,学科发展就会出现创新不足的问题,新的理论流派就难以成型。学科发展应该是范式创新与范式精致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只有自发的细小和分散化的研究,没有一个朝着建立学说体系的方向努力的动力,旅游学科的理论品格和学科品牌就树立不起来。

谢彦君:我觉得你的这个评价可以概括为学术界“两个自觉”的缺位:一个是学者个人科学研究在理论特色方面的自觉,可以叫作个体自觉,以及同一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在理论范式创新上的自觉,姑且叫作集体自觉。有了个体自觉,最起码个人的研究会避免碎片化,逐渐形成个人的研究特色,甚至走向理论范式的独立创新;有了集体自觉,就会促使大家积极整合旅游这个纷繁复杂的知识领域走向理论化和理论体系化,整个旅游领域的碎片化知识得以整合,范式创新因此成为可能。目前,可能这两个自觉都是缺位的。由于缺少个体自觉,研究者不仅缺乏理论主张,而且连研究领域都不稳定,这当然会影响理论创新了;缺乏集体自觉,就会导致学术界同行安于研究领域的认同,形成以研究领域为界别的学术共同体,比如酒店学术同行、旅游地理学术同行、会展学术同行等等,而不是以理论观点作为学术流派的培育基点。这可能是制约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

王 宁:由于长期以来的学术欠账,我们在 20

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既囿于信息匮乏,也囿于基本功训练的欠缺,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自信进行范式创新。我们只好采取“拿来主义”,侧重介绍西方的理论。等到介绍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拿国外的理论范式来对国内现实进行运用性、解释性的研究。既然范式和思想是国外的“大佬”给的,我来做点点点滴滴的推进就好了。这种研究,就是范式内的精致化研究,基本上是顺着前人的研究再推进一步,属于推进式、接力式的研究,而不是范式革命的研究。

而2000年以后流行起来的量化考核制度,则助推了这种范式内精致化研究的流行。在“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面前,我们没有时间从事那种自由人的天问式研究,借用排球比赛的术语来说,我们只能做“短平快”研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个人保饭碗和提职称,也为了学科评估和排名,“十年磨一剑”不但太过奢侈,而且是近乎学术自杀的行为,因为还没等你磨到三分之一,你就要卷铺盖走人了。所以,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学术成果量化考核的走火入魔,这一代年轻学者赶上了压力非常大的时代,他们缺乏能够让他们坐得下来、静得下心的氛围和环境。

肖洪根:是的,目前盛行的科研考核制度,与院校资源分配、教师职称评定挂钩,使得研究者只能跟着考核指标走,想静也静不下来,与原本应该自由奔放、满足好奇心的科学精神甚是格格不入,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研究与学科本身的原生态发展。目前旅游院校的研究队伍,尤其是年轻的教员们,迫于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的需要,过分热衷于发SSCI期刊论文,作短平快的重复性/验证性(replicational)研究,知识贡献与理论突破甚为堪忧。虽然个别或个体的情形总有例外,但整体而言,良好的学术生态与氛围,应该有制度的保障,方能在知识生产、理论创新等方面有所作为。目前,我们似乎迫切需要一些国家/地区、一些院校甚至一些学科,在科研考核方面,另辟蹊径,推出或推行更为“生态友好”、行之有效且又有别于现行的科研考核(RAE)制度。

马波:我所看到的与你们谈到的并无二致,对于个体自觉和集体自觉的缺少,亦有过深思之后的迷惘。我只想,大学里青年教师尤其纠结、挣扎,

最需要人文关怀。但愿学术生态能否极泰来。

谢彦君:说到这个话题,我们都有同感,也好像都是痛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都老了?对这个问题有时不免会产生很大的困惑:为什么大家都感觉有问题,但制度的车轮却依旧滚滚向前?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某种片面性吗?还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目前的机制是一种阶段性的必然?某种机制得以运行,必然有某种文化做支撑,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生态问题。人们不假思索用行动拥护现行的考核机制,这种用脚投票的趋利避害行为,符合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对此种机制进行批评的“语言表达”,是不是都显得矫情而无奈?一般科学理性在与已经获得生态合理性的现行科研考核机制博弈时,其无力感是可想而知的。

王宁:这涉及学术共同体缺乏自主性的问题。学术单位和学者跟着行政的指挥棒转,是因为学术单位以及学者的资源和命运都掌握在手持指挥棒的人手里。从管理者的立场看,量化考核和形式化评价最为高效省事,避免了许多管理上的麻烦。而实质性评价虽然更公正,更符合实际情形,但在人情文化盛行的地方,会惹来很多麻烦。而对高校的行政化学科评估排名则直接影响高校发展机遇。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高校就会按照行政化、形式化的评估指标来要求学院、系和教师,把指标层层落实下去,并落实到教师的职称提拔、年度考核和研究生培养上。

肖洪根:现今我们熟悉的科学研究,很多情形已经沦为规模化、制度化、体系化或产业化的研究生生产。这个流程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发现问题、遵循方法、找到答案了。政府、企业、组织要立项资助各类研究;研究者可以申请经费来源不同的各种基金课题;到了末端,成果的交流、发表或发布,还要牵扯到知识产权、出版机构的私有化运作(绝大多数)、以及是否(可否)推行开源性知识传播等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如前所述,还有代际与传承等问题。

保继刚:“规模化”“产业化”的知识生产强烈地表现在论文发表会高度集中在部分人身上,团队大的教授发表就多。中山大学今年评职称要比较拟升职的老师与所在学院对应职称的老师的平均科研成

果(项目、论文),也就是说,要晋升教授职称的老师,他的成果要与现在教授的成果比,原则上要达到平均数。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教授一般都有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科研团队比较大,一般而言发表论文会比较多。这种首先比较数量的方式,更加会助长年轻学者“短平快”地去发表论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很难晋升职称。

谢彦君:这个做法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按照这样的标准,在交易成本理论方面卓有贡献的科斯先生恐怕一辈子别想当教授了。每每想到当今盛行的一些考核、评估、排名机制,都会感觉到很无语。学位论文先要让机器过一遍,检查一下重复率;大学品质、教授品质都要用数量指标去衡量,于是难免出现枪手生意兴隆、快手畅行天下的局面。在此类问题上,占据科研评价主体地位的“人”都哪去了?“人心”都哪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哪去了?用数量上超过平均数来衡量科研人员的科研水平和贡献,这能讲得通吗?平均数是什么?平均数对应的就是统计学家奎特勒的“平均人”的概念,平均人就是庸人。难道科学研究要靠庸人来担当?这在理念上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别扭。

王 宁: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学术行政化的问题。让我们转到学术的代际传承和断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用黑格尔的观念来解读,叫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逻辑的统一是说学术脉络在不断演进。社会学界有位学者叫帕森斯,他研究的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所有的学生都会用这个范式,但它很快就走向了衰落。为什么?因为功能主义太保守,它具有偏向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内涵。后来,左派和右派都开始批判它,于是就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福柯的解构主义等。这样就变成了两个代,一个是功能主义代,一个是后功能主义代,并且从前一代往后一代转变,是存在逻辑联系的。这个逻辑链在自然科学中也很明显。原来是牛顿力学,后来发展到量子力学,这就是两代。为什么会出现两代人呢?这又要把历史因素考虑进来。历史因素可以体现在代与代的更替上。上一代人还在位的时候,会拒绝量子力学方面的投稿,等到他们衰老了,权力旁落,量子力学的研究者再来投稿,就能被发表。而新一

代掌握学术话语权之后,量子力学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来看,这里面涉及两代人的权力斗争。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代际之间的转换可能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可能正是因为前代人都退休了,下一代人才能有机会走上学术论坛。比如现在50后开始退休,70后非常开心,因为只要上一代人不退休,他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有一个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社会学的教父》,讲的就是50后、60后有过山下乡的经历,社会经验丰富,进入政坛如鱼得水,进入学术界也由于具有不同凡响的社会洞察力,其中许多人不但成为学界的带头人,而且还成为知识界握有权力的人物,比如院长、系主任等。这代中层领导干部一直占据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以致后一代人根本没有机会主导学术资源的配置。这就是历史的链条。

谢彦君:你把代际转换这个概念的内涵,拓展到理论范式创新层面上来了,我觉得这非常好,是一个认识的飞跃。也就是说,我们说代际转换,要有一种新的使命感:不光是个人研究领域、研究重点、研究身份的代际转换,还要转换到理论观点的代际提升上去。代际转换要伴随着代际升级。这种升级是学术观点在代际的传承、延伸、拓展甚至革命,是理论知识走向体系化和学派化的标志。不能说大家都是研究旅游的,新一代就产生了,新的时代就来到了。只有大家在研究旅游时,产生了延续几代的相同的——与之相对,同时也可能有若干派系与之相抗衡的——理论观点,我们的代际转换才算真正具有理论成色和学科价值。

王 宁:我是说,学科发展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学科的前后演变有逻辑链的衔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老一代还在位的时候,新一代可能会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新出现的历史条件,会成为新一代学术创新的有利因素。如果某一代在某个历史阶段,正好赶上了某个机遇,也可以很快超越前一代。比如说,77级、78级正好赶上因为“文革”导致的学术断代,很快就进入学术界的核心位置。今天的年轻一代正好赶上了智能手机和大数据的出现,就会在新型研究资源的获取上,比前一代人厉害,这或许会加速具有逻辑链关系的范式革命的提早到来。

肖洪根:这番关于历史链、逻辑链的表述很有意思。关于学术脉络或学术生态,我觉得,范式的选择与分类,在促进与推延(阻碍)学术派别的形成与发展方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上述关于“量子力学投稿与发表”历史链的例子,让我想起早年 Jafarian 时代,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对定量模型类来稿和过于商业性选题研究之排斥,也正因为如此,该刊营造了一种学术个性、学术脉络或学术圈,截然不同与其他期刊,比如,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王宁:的确是。有一年 Annals 编委会在澳门开会,有人要求 Annals 多发旅游经济类、旅游管理和营销类的文章,Dann 当即斥责,大佬一致附和 Dann。关于知识创新,其实两代人的知识创新逻辑是相同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文革”结束,中国恢复社会科学建设的时候,“文革”前接受了大学教育或从事学术研究的那一代人,刚刚从“牛棚”出来,教不了太多新东西,其中一些人大多是依靠“文革”前打下的功底,或者靠自己“野性的思维”所建构的本土知识体系,来完成教育任务。77级、78级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而挑选出来的人。即使老师的知识已经陈旧,即使学校图书馆没有几本新书,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包括中文、历史等老学科),通过“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方式培养,也一定会冒出优秀人才。但77级、78级这一代人的致命缺陷,是在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套路,是他们在后来随着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而慢慢学到的。这一代人成为学界的“教父”。

谢彦君:确实,在这批人的身上,就他们的学术素养而言,可以说是“极端的敏锐”和“极端的迟钝”的混合体: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感以及对学术规范的迟钝感,最终促成这一代人在学术上容易相信个人经验。

王宁:没错。后来进入高校的学生,就是在“文革”后恢复高考而进入大学的较早的几届毕业生教出来的。当时本科毕业生可以留校,研究生文凭是后来补读的。“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几届大学毕业生,比起他们的早前从“牛棚”回来的老师,学术水平更高。这使得80后和90后大学生,比起50后、60后的大学生,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同时,80后、90后

这一代大学生还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海外的东西,能够直接查阅外文数据库,视野更开阔,也有更多的经费来从事田野研究。只是他们现在还处于积累期和上升期。但最近十几年实行的量化考核制度,对80后、90后这一代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些新生代面临了前面说的学术考核机制导致的急功近利的问题。这不利于学术的范式创新。

马波:各位的表达让我想到了《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他在美国执教和论文发表上的遭遇令人唏嘘。后来有人批评历史学在持续的专业化细分中,学者分工详尽,使历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历史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培养的青年人带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忘掉了望远镜的功能,犹如“雨人”一般。许纪霖说过,如今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据说,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王宁:考核机制对学术繁荣、增加产出当然有正面的作用。但它对学术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这种负面影响,似乎是全球性的。美国也有考核机制,并且近年来的考核也比过去严厉,现在似乎也面临大师级学者越来越少的局面。英国也是这样,鲍曼出现之后,我们就一直在问,还会有第二个鲍曼吗?似乎没有。当然也逐渐冒出来一些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但是不像吉登斯、鲍曼那么年轻就大有名气的大家,这就是考核机制过于短期化带来的结果。现在,考核机制短期化变成一个全球化现象,这可能会导致全球化的学术碎片化。当然碎片化也有好处,就是一点一滴的创新会有很多,但不能否认的是,碎片化会使得有影响力的大学者变得很少。所以,不改变考核机制,真的不行。考核机制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有实质性的评价,比如同行评价,也要有一定的量化指标。

马波:其实这个考核机制也是资本主义的方式。

王宁:对,量化,效率主义。

保继刚:这种效率主义的考核导致了“功利主义”的问题,比如教师与学生合作文章的署名问题,正常的学术指导和交流也会被要求“挂名”论文,

学生和年轻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成为被动吃亏的一方。

谢彦君：这个机制本质上是把本来适合采用目标管理的科学研究工作，换上了泰罗制的过程管理。从终极目标上看，这等于缘木求鱼一般。王宁你所说的这番话，指出了现行科研考核机制的弊端，同时也反映了你对这代人的期望，或者说我们大家对他们的期望。也就是说，这一代人还是有可能实现科学理论的创新和理论知识体系化的，因为他们整体基础比较好，现在的贡献也相当可观。而一旦大家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可能促使中国旅游理论更早地走向体系化。但前提是学术生态要好，考核机制要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

王 宁：过去我们导师都说多看书少发表，现在不但是不发表就出局，而且是发表少了（没达到规定的篇数）也出局。博士后刚进站，就想着要发很多篇文章，因为只有多发文章，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这种过度焦虑就是由我们的考核机制和用人机制造成的。在指挥棒的指挥下，我们都陷落为发表机器。据说有人恶作剧，编了个软件，让软件自动写论文，居然发表了。从效率的角度看，我们虽然是写作机器，但在写文速度上肯定干不过真的机器。

谢彦君：这种考核机制其实还可以联系到继刚曾提到的早期教育。比较起现在的基础教育，我们那时可以说很自由。在6、7岁的时候看小人书，10多岁的时候看小说，在大学里有时候还可以看杂书，因为没赶上后来的“张榜”考核的教育时代。看看现在的情况，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已经开始训练做题能力了，家长恨不得早早塞给他们一脑瓜知识，上学之后几乎就是一个不停歇的做题生涯。本来处在游戏玩耍、读杂书的时候，这些孩子却都在做题，在小学做题，在初中做题，在高中更是在做题。到了大学，需要他们展现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来做科研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缺少这些东西。所以说，中国现在的基础教育，从做题训练上来说那一定是世界第一，但从科学训练上，我看就是扼杀科学兴趣、科研能力。整个基础教育扼杀了青年一代的创新能力，以致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只能做一篇一篇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小论文，每篇论文还都可能互不关联，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

保继刚：是的，这就是我们缺少创新人才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课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目的是希望改变学生12年应试教育形成的学习方式和思维习惯，要从大学一年级抓起，让孩子们开始大学一年级，而不是高中四年级。“中大”旅游学院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不能有半点松懈，不然学生很容易回到读书找标准答案的惯性中去。说到读杂书，我想到一件事。我在小学读儿童版《水浒传》，初中看了原版。1995年我到加拿大，那时候正好碰上加拿大调整移民政策，当时申请移民比较容易，有博士学位的基本都能申请到。我去了一个月就得出一个结论：“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这句话出自《水浒传》，意思是这里虽然舒适，但不是可以久留的地方。就因为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这种文化基因让我意识到，加拿大这块土地不是我的土地，这块土地始终是西方人或者说白人统治的一块土地，我们在这里始终是客人。我认识的华人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们始终觉得他们在这里是作客的。所以我打定主意还得回国，所有的学习都不是为了留下来而学习，而是为了回去有用而学习。这就是我理解的读杂书的意义。现在，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有没有人读过《水浒传》，没有几个举手。

马 波：他们可能看过电视剧。我曾经应学生组织之邀，在读书会上讲自己最喜欢的书，第一本是《西游记》，我以为会有共鸣，什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超常联想能力和幽默滑稽等说了一大通，讲中间发现氛围不对，问他们看过原著吧？好多人摇头，说只看过电视剧。我只能尴尬地把罪过归于严酷的高考制度。

王 宁：除了知识面，还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和逻辑性方面的问题。西方学生从小抽象和思辨能力很强，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是科举制度，考的是文学和修辞，都是形象思维和具象思维，抽象思维能力没有得到锻炼。黑格尔说，中国科学不发达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中国语言的影响，因为汉语里没有介词。黑格尔的观点对不对另说。但我们中许多人的思辨力不足，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就是一个逻辑推演过程，缺乏分析能力也进而限制了逻辑思维的发展。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

德就提出了三段论,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就出现了。由于抽象思维的传统没有中断,即使是在中世纪也有侧重抽象思维训练的经院哲学。因此,一旦在启蒙运动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之后,西方就不断会有科技创新。而中国古代文言文的表述多属于操作层面,一直讲究的是文学和修辞,分析性的抽象能力似乎显得不足。

谢彦君: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科学都有微词,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结论主要来自对孔子学说的直觉。其实,中国的逻辑学在先秦也是有独树一帜的一派的,名家的惠施、尹文子、公孙龙和邓析的学说,在形式逻辑上就很有特色,只是汉儒之后受到打压而没有发展起来。比如,公孙龙说“白马非马”,我觉得对今天我们旅游学术界就是一个警示:我们旅游学中存在不少形式逻辑错误,把一些不是旅游的东西,或属于旅游构成部分的东西,都说成“是旅游”了,这种典型的“名实论”方面的逻辑错误,我们很可能还不自知。这就是你所说的逻辑性方面的问题。

王宁:我再举一个例子。复旦大学一名理工科学生曾经到英国与那里的博士生一起讨论几何学,英国人告诉他,这个点是抽象的点,而不是你看到的那个经验的点。那个学生不同意,认为点就是经验的点,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点。然后他问我同意谁的看法,我说我同意那名英国学生的。在几何学上,点是一个抽象的点,那是抽象思维。在古代希腊,这个点就是抽象的点。这名中国学生一直到现在都不同意我的观点。从这件事情我就发现,中国长期以来缺乏抽象思维的训练,没有抽象思维怎么把复杂的现象概念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无法形成自己的概念和理论的原因。现在我们的大学有逻辑课吗?没有,只有哲学系里才有,实际上应用学科都应该开设这门抽象思维训练课。我曾经也和国外生物系的学生讨论,我发现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强,而且很有概括力,而我们这边的思维太具象,用抽象语言给学生讲课,学生根本听不懂,一定要举个例子才能听懂。

保继刚:话题稍微有点远了。刚才谈到,我们现在发表文章的数量增长很快。关于这个话题,王宁谈到一个观点,就是由于考核制度的压迫,大家追求

文章的数量,致使成果带有碎片化的倾向。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如果说只是数 paper 的数量,确实是增加得很快,不管是中文发表的文章,还是英文发表的文章。

谢彦君:我去年在中国知网上查了一下,这40年,标题中带有“旅游”的中文文章,一共有72万篇,这应该是很多了。

保继刚:如果我们能在五人对话里把这个问题指出来,然后稍微再延伸一些,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点。也就是说,我们期待能够出现系统化一些,或者宏观一点的著作,但是实际上,现在出现的是碎片化的东西比较多。关于这个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要延伸的吗?

王宁:亚里士多德讲,只有中产阶级才有学问,就是衣食无忧才行。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非升即走”,怎么可能安下心来做学问?

谢彦君: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实际上今天有不少人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但还是在做碎片化的学问。比如现在有些学者,已经评上了教授,工资也都相应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继续在碎片化这条路上走,还是一直在发表 paper,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前面所说的机制使然,另一个原因呢,恐怕就是社会生态的问题了,也算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个体拒绝在应走的道路上行走,那既有个体的因素,也一定有社会的文化生态的因素。我觉得我在写《基础旅游学》的时候,纯粹是无产阶级。

王宁:你有情怀。

保继刚:有情怀,有理想。还有,那时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心无旁骛。

谢彦君:也不是有情怀,就是兴趣和好奇在推动我,另外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我从1995年开始写,写了五年,1999年发表。虽然那本书也不怎么样,但那个时候我真是花了很大的工夫,把国内的文献和能看到的国外相关的文献,都尽我所能地梳理了一番。那时,找文献还是比较辛苦的,现在文献的获得要容易多了。如果我们逐步把旅游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知识都逐渐体系化,比如旅游经济学或是旅游营销学,能够系统化地整理在这些领域里发表的文章,就可能会有助于旅游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大量的研究成果还没被纳入我们的教材中,某些

领域也很少有集大成的专著出版，而专著就需要一些人做体系化的工作。因此，知识的体系化需要唤起学界在这方面的自觉，避免全部都在做一些碎片化的工作。

王 宁：一个是要自觉，还有一个就是考核机制要改进。

谢彦君：在考核机制短期内改变不了的情况下，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有些人来做一做？

王 宁：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曾经说过“给天才以空间”，是吧？

保继刚：为中才立规矩，给天才留空间。

王 宁：但是还是没有做到。

谢彦君：现在是年年考核，年年用相同的数量指标来考核，考核也不分对象。

马 波：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副教授就成了诺贝尔奖得主？

保继刚：那个是她在博士生阶段跟着导师做出来的。

马 波：西方文化有重视逻辑思维和抽象能力的传统，学者看重终极关怀。而我们好像很少有终极关怀，都是说要挣钱买房子，要尽快评职称，所以才拼命突击生产论文，功利性很强。

谢彦君：这个问题可以引用《荀子·儒效》里的几句话来说明一下。荀子把人分成四种，实际上是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说的，这四种人分别是民、士、君子和圣人。圣人可以不论，单说民、士与君子。在荀子看来，民能够守住民德就不错了。什么是民德？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作为自己的至道，这就是民德，是普通老百姓所追求的。士也叫“劲士”，他的阶层特征应该是“不以私欲乱所闻”，是说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听了什么就顺着改变自己的态度，这就是劲士。接下来是君子，君子不仅不为一般的听闻所乱，还要修养性情，等等。另荀子还转述孔子对“士”的界定：“富贵不足以益也，贫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荀子·哀公》）我觉得荀子的这个观点可以拿来接续刚才的话题，实际上，今天的知识界里，是不是大多秉持的都是平民意识，从俗，以货财为宝，还要专心于养生？如果是这样，责任也许不完全在这个阶层本身，而是内外两力夹攻的结果。在目前的机制或学术生态下，我们这些在

古代属于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降格为一般平民，已经没有了原来士人阶层的情怀了，也就是你说的没有终极关怀。

马 波：说到这儿，我插一段，《大学》开篇的一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现在的学人似乎很难“止、定、静、安”，故而深虑少、真的少。本末经常倒置，终始难能连贯，先后次序混乱，那是远道啊。把学术职业化或商业化，其实是从功利化、工具化的视角来看待学术。真正的学术不是功利化，是求道。

保继刚：职业化和功利化不是一回事。职业化是说一个人在特定岗位上所付出的相应劳动，比如教书这份职业要求老师批改作业，给学生辅导，并把这些做好。现在我们既不是很职业化，又不很专业化，因为现在一个老师承担着无数的职能，他的主要职能还常常被很多其他职能干扰。再加上我们的分配制度和西方不一样，学者还有机会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报酬，也就决定了我们还有另外的诉求。所以说，我们的职业化并不彻底，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职业化。

我们大学要承担的东西太多，比如有时会抽调老师出去扶贫。当然扶贫应该有，这是人文关怀，但不属于职业化。假如学院的老师人数刚好够教书，那再抽两三个去扶贫，学生还能上课吗？不能。为什么能抽调这么多人去挂职呢？说明现在学校里的老师太多。今天的北京大学或是清华大学在很多方面可以跟美国的大学相提并论，大多是因为我们玩的是人海战术。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指出的。哈佛大学数学系有多少个老师呢？真正的数学系老师只有 20 多个，而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最少是上百人。我们中山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正教授超过 100 人，副教授大概 50 人，还有二三十个讲师。在香港大学，这样一个系可能有二三十个老师就很了不起了；像地理专业，香港三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加起来不到 45 个老师。在大陆，申请博士点的最低门槛要有 45 个老师，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香港三所大学加起来在内地申请不到一个博士点。

尽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但是有必要说出来。现在在某些方面,我们打的是人海战术,可能新学科好一些,比如我们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老师不够,大概有30个人;其他的老牌学科,学生人数甚至不到我们三分之一,却可能有60个老师。中山大学的文、史、哲教师体量大概各是60人,北大相应的可能是100人,而北大的学生人数比我们少。我们今天的现状就是,教师没有完全实现职业化,刚刚说的碎片化又是另外的问题。

王宁:对,我们跟其他学校相比,人数体量还不够,所以中山大学现在就继续扩大体量,还在拼命地招人。比如我们的社会学,其他学校都是六七十人,我们就只有30个人,所以说要扩大一倍多。这个就是学科评估指标的问题,为什么不按人均而要按总份额来评估?按人均来评估,哈佛这些学校就很厉害,但是按规模的话,这些学校就不及我们。

保继刚: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差别。我们跟欧美国家对比,在欧美国家,做到系主任或是院长,教学工作量是要减免一部分的。比如每天的工作时间以8个小时为基本单元的话,可能就会有6个小时是要用于处理行政事务,这个时候就不能抱怨只有2个小时做学问,因为这个是行政岗位。我们现在要对比的是没有行政职位的老师。

马波:我们的社会也许需要开展欲望管理。大学青年教师为生计所迫,要忙活“俗事”;小康了、甚至富裕了的教授也会崇拜孔方兄。由于不发表文章可能会被解聘,所以又要被动地忙活发表的事。我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出于这些目的。

保继刚:“欲望管理”就是职业化,英国是12个月工资制度,教授不得兼职;美国是9个月工资制,教授可以另外兼职或科研取酬3个月;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崇拜孔方兄不可避免,只是程度不同,50步和100步的关系。但无论在哪个国家,不发表肯定是不行的。

马波:是需要发表,不然就沦为寄生虫了。有句流行语叫“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问题是在这种情境下,往往鼓起的是数量,像纳什那样的大师就半道牺牲了。刚刚说到碎片化,不知道大家怎么来定义它。我认为碎片化不是研究对象很小,而是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解释缺乏足够的知识

体系和网络,是就事论事,一叶障目,说完拉倒。

保继刚:对于碎片化,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理解的碎片化是,某个人做研究时,逮到一个subject(话题)就去发表一篇文章,看到另一个subject之后,又急忙忙来发表文章,也就是说,很难在一个方向深挖下去。我们常说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但现在很多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正想着能发表就好。你问他机理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说没有做过专门的调研。

王宁:有点机会主义,哪个容易发表就发哪个。

马波:碎片化就是瓷器被打得粉碎,地上只有小瓷片,看不出、拼不成甚至无法想象成型的器。

肖洪根:我觉得碎片化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一次一个话题,先发表再说。另一个则是学者基于自身的兴趣和资源,长期关注一个主题领域,以碎片化的方式,东一拳西一腿地对它进行“个别”研究,使得自身的研究至少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主题领域形成一套东西。我觉得这可能还是狭义上的非(去)碎片化。更高层面的去碎片化是指,所做研究能够与旅游学这个知识体系形成关联。

谢彦君:我理解的碎片化是基于学科的,并且具有层次和类型的区分。也就是说,首先,如果研究成果不能为任何一个确切的学科贡献知识,而是游离于所有学科之外,那么,这种研究成果是学科之外的碎片化成果;其次,即使研究成果可以归并入某一个学科,比如旅游学,但是,成熟的学科都是由若干理论范式构成的(比如同样是经济学,有芝加哥学派、有奥地利学派、有凯恩斯学派、有马克思学派),如果一个研究成果不属于或不能构成某一个学派的理论,那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成果,目前,迫切需要指出和大力推进的是这一种情况;最后,即使研究成果表面上可以或试图归并到某一学派,但体系化的理论知识要求命题的丰富性和自洽性,不能与已有学派的理论命题保持自洽或一致性的研究成果,也还是碎片化的成果,这种情况现在也颇常见。

另外,我也特别关注教材建设,因为它是相关知识体系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如果以论文形式存在的旅游经济、旅游心理等各个领域里的知识,能够整合成为一个体系,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在理论知识的体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你们前

面所说的内容，我也完全认可，你们说的是研究的碎片化，我后面说的是知识体系的碎片化。我认为，理论知识的体系化或非（去）碎片化，对整个旅游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都是很重要的。

马 波：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各个领域的知识至少能像糖葫芦一样串起来。糖葫芦只是用一根杆串起来的，最好是像一颗果实累累的山楂树，实现有机联系。

谢彦君：应该至少有几个学科或者分支学科往这个方向走了，像营销学，在这个主题下发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

王 宁：看来，短期内，以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为特征的量化考核机制还会成为当下不可逆转的学术生态。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中，如何让旅游学科发展起来，需要旅游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保持应有的定力。特别是 60 后的学者，已经功成名就，可以超脱一些，多做一些大学问，要有成就理论流派的底气。同时，主动扶持年轻学者的发展。

谢彦君：我还想说的一点是，可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处于待启蒙状态。也就是说，到今天，我们科学界的部分成员是否真正弄清楚了什么是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是理论创新、什么是理论应用、什么是知识贡献？我看，答案不容乐观。也就是说，现行考核机制的盛行，其病理也许与我们科学界自身的科学哲学素养有关。一种比较尴尬的情况可能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劲头十足在做的东西，可能并非科学知识的创新。它们也许是科学知识的应用，也许是技术创新，而这些，已经和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东西了。

王 宁：其实，中央也意识到“钱学森之问”所涉及的问题的严峻性。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决策层不可能对那些具有负面后果的、过于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量化考核和学科排名制度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否则，就会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显然，学术生态的好转，还是值得乐观期待的。当然，囿于“避责”行为和形式主义在官场的蔓延，这种乐观只能是审慎的。

Random Thoughts on Tourism Studies:

A Dialogue amongst Five Scholars (IV)

Chapter Four - Ecosystems of the Academia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WANG Ning, XIAO Honggen, XIE Yanjun, BAO Jigang, MA Bo

Abstract: This part of the dialogue addresses the eco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ourism Studies as an exemplary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sues include, and are not limited to, 1) The current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along with its various quantifiable measures has acted as an inhibitor rather than an enabler of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2) Notable manifest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Tourism Studies as a field and corresponding features in it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3) The roles of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in maintaining the ecosystem of the tourism academia. We believe these reflections are of implications to the growth of Tourism Studies as a research field or sub-discipline, to career advancements of individual researchers as knowledge producers working in this community, and to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administrators who are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ourism.

Keywords: academic ecosystem; knowledge production; research assessment; innovation; Tourism Studies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洪根，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彦君，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波，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9-07-20